



供了经验证据。实证分析还发现对于上述长三角样本中的大多数而言，市场一体化促进了经济增长，意味着长三角已经告别了以邻为壑的经济增长阶段。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结论和研究不足。本章的模型和实证有助于理解不同发展水平的地方政府对待市场一体化的行为动机，从而为中央政府推进全国市场一体化和协调区域发展提供了参考。

二、文献综述

有关我国市场一体化和非一体化问题研究，沈立人、戴圆晨（1990）提出的“诸侯经济”，以及 Lyons（1985）提出的“蜂窝经济”（cellular economy），都形象地反映了市场非一体化状况。近年来，Young（2000）以及 Poncet（2002）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市场非一体化的程度，Young（2000）以“零碎分割的内部市场和受地方政府控制的封地”来评价中国国内的市场分割，Poncet（2002）认为中国国内省际市场的分割程度，接近于欧盟内部国家之间或者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分割程度。Young（2000）和 Poncet（2002）的研究结果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Naughton（1999）利用投入产出数据，以及白重恩等（2004）利用区域专业化数据，都得出了支持中国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的结论。李善同等（2004）则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市场分割依然存在，但程度已经很大减轻。

上述研究都侧重于对市场一体化或者非一体化的程度做定性或者定量的判断，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市场（非）一体化



程度的认识，但本章更为关注的是市场一体化或者非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机制问题。这方面文献中，大多数探讨市场非一体化的原因。如林毅夫、刘培林（2004）认为，改革开放前的赶超战略在各地区的衍生，使得各地区制定了各自的赶超计划，导致了地方保护。陆铭等（2004）认为，“落后地区选择暂时不加入分工体系，虽然它将失去当期分工的收益，但却可以提高自己在未来分配分工收益的谈判中的地位，甚至可能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所以落后地区选择市场分割。周黎安（2004，2007）率先从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博弈视角，解释了市场非一体化的原因，其设定上级政府对下级地区政府经济绩效进行考察，绩效较高者获得提拔，这样的晋升博弈将导致“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陆铭等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认为，“在市场分割程度不太高的时候，提高市场分割程度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市场分割程度超过某个临界值后，经济增长就会受到负面影响”。从上述研究的视角出发，都能够一定程度上解释市场非一体化为什么能够发生，但这些研究都未解释市场一体化为何发生。在解释市场一体化的成因方面，徐现祥等（2007）通过比较长三角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利用经验数据发现市场一体化的区域比非一体化区域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个结论可以用来解释市场一体化为什么能够发生，但难以解释非一体化区域持续存在的原因。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1）文献没有把市场非一体化和一体化作为一个连续状态进行考虑，割裂了市场非一体化和一体化之间的联系，因而只能解释市场一体化或者非一体化两者之一，难以解释两者之间的转变；（2）文